《本命年》

一  背景——萦绕在《本命年》中的氛围
李慧泉的悲剧在于，80年代的中国,既有类似叉子家人这样穿着粗布棉衣的人，也有类似赵雅秋这样急于袒胸露乳的人，而他对兄弟义气的执著，类似骑士的情怀，无法言传更无从界定的向往，预示着他最终消失的不祥之兆。
此时，我们可以恭维一下中国的教育制度，它将我们一生中最富生命力的青春关在学校里以保证社会相安无事。这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是最成功的一次洗脑活动，它能让你相信心甘情愿地认为杀人是错的，蹲了监狱就应该遭人唾弃的，而且不必追究这一切的原因，就算追究也会以“你就是十恶不赦、罪大恶极、伤天害理的”为前提。
李慧泉便处于这一教育背景下，但是，80年代的中国，风起云涌，鱼龙混杂，思想混乱。这还得追溯到六七十年代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可谓全国总动员，儿子可以抖老子，妻子可以揭发昨晚同住一床被子的丈夫，这场运动带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一次信任危机，人与人是用利益拴在一起的。80年代李慧泉所执著的东西成了一朵圣洁的白莲花，人们谈论，却从不追求。
这样经历过一场运动洗礼的人们，在看到没有见过的物质和陌生的文化时，就慌了手脚，可口可乐、卷发、内衣内裤、黄色录像带、杰克逊的歌等等这一切不断挑战人们的观念，演双簧的那两个人，穿着袍子，一会扭秧歌，一会跳迪斯科，两个老头在外来事物面前如此滑稽看着这样一个混乱的表演，我们是应该大笑，在笑的同时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发笑。
倚靠这一背景，我们在《本命年》中看到不要罪犯儿子的叉子一家人，看到小妮子到舞女的成名，看到投机的商人，看到兄弟义气走向兄弟利益。
二  影片分析
用一句话来讲述这一故事：由于三年的强劳使得李慧泉与处于巨变中的社会脱轨，他不能弥补这一差距因而失望致死。三年强劳后，他的朋友亲人一切都不存在，影片前三十分钟向我们交待了他孤身一人，为了寻找到能够弥合这一缺失的东西，他开始接近赵雅秋和崔永利，这是呈现在银幕上的追求，而他潜意识里想要抵抗的是社会经济大潮所带来的混乱，在期望与现实拉开了一道鸿沟而且无法愈合时，他自愿选择了走向死亡。
影片刚一开始是一个背影，从黑暗的地下通道走向阳光底下，这一效果要远远好于谢飞导演将打架斗殴放在影片开头的想法，这一动作提出了从哪来到哪去的疑问，“从哪来”这个问题是电影前三十分钟做好了足够的铺垫后由一个闪回镜头告诉我们的，我们知道了主人公李慧泉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工作（工厂倒闭），没有了朋友（一个被撞死，一个被判无期，与死无异），然后当我们看到他为了哥们义气打架甚至误伤人后，对主人公起码我们不会有排斥心理，最重要的是对于一部探讨社会经济大潮中何去何从的影片，“从哪来到哪去”与结尾部分李慧泉受伤后逆人潮（此处人潮可以比作经济大潮）行走这一动作完美对接。另外，从黑暗走向阳光分明昭示了李慧泉劳改后的憧憬，这一期盼与李慧泉跌跌撞撞走向暗夜的对接，让人钝痛。
从阳光到暗夜，人物间的对白充斥着“就那么回事”、“没劲”这些情绪，唯一一个灿烂的生命是初见时的赵雅秋，她的出场唤起了李慧泉一生中所有的美好——童年时的两小无猜以及少年时的情同手足，李慧泉为之定格的这一镜头让他也让我们以为在赵雅秋身上，李慧泉可以找到能够整饬他此刻这种混乱无序的生活的东西。三次送赵雅秋回家，特别是第三次镜头定在那里，我们看着李慧泉载着赵雅秋向我们靠近，在这一单纯的行为背后不仅担忧这个笨拙的大汉怎样可以得到安慰，或许他就是想看着赵雅秋这样一直干净纯洁下去，所以他会警告崔永利别动赵雅秋，甚至像赵爸一样结结巴巴地说：“那衣服，不好”，并且说出了自己在赵雅秋身上看到的希望“你条件好，能有出息”，而这一希望在赵雅秋客客气气地拒绝了李慧泉的金项链彻底崩盘。
伴随着赵雅秋这一主线的，是崔永利这一次情节，他带来的是社会经济大潮这一新鲜却又夹杂着让人恶心的海腥味的气息。李慧泉从来没有在崔永利身上寄托希望，从未想过崔永利是一个值得去地地道道交的朋友，然而，对崔永利的大打出手并不是出于崔永利对赵雅秋的轻薄，在生意上的投机，也不是出于崔永利脱口而出“这年头谁还有朋友”“自己护自己”这些混帐话，他想要发泄的是一种愤懑——朋友、义气的荡然无存，它的诱因便是经济大潮，而崔永利作为经济大潮意象化的人物便成为了李慧泉对这一社会最后的一击。
在看到露天剧场那段双簧表演时发出的冷笑在那么多大笑的观众面前更像是一声叹息。另外，笑并不是一种情感，欢乐才是。笑声只是我们对我们认为荒唐或无耻的事所做出的批评，那么现在用手指头数一数自己的快乐时日，可能我们还用不上脚趾。李慧泉作为这个时代的先知是他的不幸，他过早的看到十年二十年后愈演愈烈的价值观混乱现象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无力感。我想是时候正视六七十年代的那场运动了，它带给我们的伤害可能要远远大于类似焚书坑儒、文字狱这样的文化惨案，它们并没有动摇我们的观念，至少我们以前是有“侠”这一观念的。“侠”翻译过来就是今天的“信任”。
李慧泉的出路是被街边小混混叉死，死得过于安静。这是他已不再是以前打架时的常胜将军，北京也没有了类似“小霸王”“小混蛋”这样称霸一方的利害人物了。这些昔日的大角色都已臣服于金钱，当李慧泉将一沓钱狠狠的摔在出租车后座上时，他正在向这个时代叫板“什么玩意”，然而，被小混混叉死，逆人潮而行并没有让他如英雄般视死如归，也没有像英雄般一呼百应，号召大家追随他，个人在社会中深深的无力感最终结束了他的生命，李慧泉的时代便过去了，继续往前发展的是赵雅秋。
这样的时代带给我们的内心冲突外化成了对名与利如饥似渴的追求，这样对外界世界安全感的不断追逐将内心的不安放置在台风中心。很遗憾，电影只是提出问题，李慧泉已经是一个无所失的人，他的故事无法再进行下去，到最后还是借助于死来判定谁该死谁活下去，导演也无法给出解决办法。路漫漫其修远，吾当上下求索。